

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史事新证

魏众^{a,b}

(中国社会科学院 a.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b.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2488)

摘要:基于前人的研究和新的史料,本文从1911年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的会议缘起、准备过程、会议进程和决议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对此次会议进行辨正和分析。本文认为,万国鼠疫研究会是中国政府面对外部压力,见招拆招的结果。此次会议展示了中国肺鼠疫防控的经验和效果,并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会议的经验总结对中国近代防疫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时至今日,这些经验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此外,本文还对参会人员及其情况进行了考证和修订。

关键词:清末;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伍连德

中图分类号: K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2020)11-0173-10

一、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研究情况概述

1911年4月3日至4月29日在奉天(今沈阳)举行的万国鼠疫研究会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会议对中国东北鼠疫防控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分析总结,对于中国未来的防疫工作提供了借鉴。会议期间,在东北猖獗一时的鼠疫销声匿迹,东北宣布鼠疫疫情结束。这次会议留给我们很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也有很多重要的信息需要重新认识。分析这次会议,对于我们当前的国家治理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关于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会议当事人留下了会议的原始记录和私人记载,也有国内外学者作过一些研究。早在会议举行期间,国内外便有多家媒体报道了会议的情况,有的还作了专题报道。会议结束后一个月左右,当时在医学院工作的陈垣完成并出版了他的早期著作《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以下简称《始末》),是当时对这

次会议最全面的总结。东三省官员编写的《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以下简称《疫事报告书》)也辟专章概要介绍了会议参与人、主要发现以及政策建议等信息。两者相较,前者对会议进程描述得更好,而后者的资料准确性更佳。近十年来,《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以下简称《自述》)和《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译本先后出版,前者有对会议的追忆的专门章节,后者则是会议的全程记录,这令我们对会议本身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在当时的报道中,中文报道和英文报道交错出现的情况很普遍,我们经常看到同一篇文稿在国内媒体和国外媒体上以不同的语言出现,这些媒体报道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会议的有关情况。

在国内外比较有代表性的相关研究中,国内较早对该次会议进行总结的是于永敏等人,他们主要基于《疫事报告书》和《盛京时报》的报道对这次会议进行了梳理^[1];马学博介绍了该次会议与东三省防疫总处成立之间的关系^[2];焦润明等人参考了《始末》等当时的报道,并查阅了一些原始档案,对这次会议进程作了更为清晰的梳理^[3];高龙彬基于部分文献和档案资料对这次会议和东三省防疫总处成立的关系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4]。William C. Summers用了著作中一章的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计划”中国经济思想史特殊学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探索与实践研究”(17ZDA034)

作者简介:魏众,196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篇幅记载和讨论了这次会议^[5],一些国际期刊刊载的论文对该会议也有所涉及。

本文在上述著述的基础上,运用了一些较少使用的档案和资料,对上述资料中相互矛盾之处尽可能作出考证判断,对于上述研究中的一些未尽事宜进行分析,并对该会议的价值进行再研判。

二、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缘起

会议的缘起目前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是中国政府主动提出的^[3];也有认为是美国提出的建议^{[5]82};还有日本最先提出之说和俄国最先提出之说;甚至有研究认为,是伍连德建议召开这个会议的^[4](但伍连德《自述》中并没有这么讲);施肇基则回忆说“余查 Pneumonic Plague(肺鼠疫)在当时尚无治疗方法,乃建议外务部筹备‘万国治疫会议’,邀请各国政府指派专家,共研治疗之法;”^{[6]73}也有的索性讲,会议的缘起说不清楚^{[7]18-19,31-32}。但基于档案资料的考察可知,以上几种说法都有不尽不实之处。

在庚辛鼠疫爆发的东北地区,存在三方势力。除代表清政府行使地方军政实权的东三省总督及黑龙江、吉林巡抚外,还有占据东清铁路(中东铁路)及其附属地的沙俄,以及占据南满铁路及其附属地的日本。前者在满洲里、哈尔滨等地形成了聚居点,后者在大连形成了聚居区并在营口有比较强大的势力范围。这就造成了在东北防疫问题上的复杂性,譬如在交通遮断问题上的不配合(《致外部电》,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四日)^{[8]第62册,588},以及对防疫提出种种要求等。此外,日俄势力在鼠疫防控期间试图在铁路附属地大量建立隔离所,而这种可以居住数千人的隔离所,被清廷认为有可能很快会转变为军营,从而影响中国的主权。时任奉天交涉使的韩国钧回忆其在奉天办理对外交涉事务时,感到与防疫相关的交涉“尤为最大最棘手之事”^{[9]49}。当然,当此疫病流行之时,中日俄之间也不仅仅是相互提防和互相指责,也有合作防疫。如伍连德在其《自述》中就提及与俄国在哈尔滨的管理者和医生的交流,他的防疫方略率先从俄方获得了实质性的支持,他也曾借鉴

了一些俄国的防疫经验,等等^{[7]51}。另外,在东三省请来帮助防疫的洋医中,也有不少日本医生的身影。因为在此次防疫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外交交涉事务,故而该次疫情防控中方主要由外务部主持。而中外各方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则是从地缘政治视角作出的解读。

1911年1月,俄国提出邀请各国医生前来东北考察,并告知中国政府,他们已经开始行动,并通告了各国(1月19日,驻华盛顿的沙俄大使向美国国务卿诺克斯提出建立国际联合调查团,研究东北鼠疫流行问题)^{[5]82}。外务部意识到“此事关系主权,碍难听彼干涉,亟应由我设法倡办”,于是通知东三省总督锡良“业经通电各驻使暨通照在京各使,径请各政府选医前来考察致疫原因暨防救方法。到京后旅费供给均由我认,如各国医生到东考察,希飭妥为接待。并转吉江两抚接洽。”(《外部来电》,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8]第62册,641}这应该是邀请各国医生来华的第一次较为官方的表述,时间是1911年1月25日。这不仅是停留在建议层面,而是已经通知了各国使馆。事实上,在锡良接到电报之前的1月22日,中国外务部已经给各国政府发出电报,邀请各国派遣鼠疫防治专家来华考察^{[5]83}。1月24日,美国驻华大使卡尔洪(W. J. Calhoun)致电美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 Knox),汇报中国外务部邀请外国专家来华调查病因和研究治疗方法,并提供预防措施一事^[10],并开始着手寻找合适人选。欧美各国显然也接到了类似的电报,他们都纷纷挑选合适人选,并上报给清政府。被选中的外国医生则陆续告知媒体,自己被选中前往中国参与防疫,如《纽约时报》1911年2月19日伦敦报道:英国的法勒(Reginald Farrar)博士周一将启程去哈尔滨参加国际鼠疫委员会,该委员会旨在为中国提供遏制鼠疫爆发的方法^[11]。次日,该报刊发《加里奥蒂将去抗击鼠疫——中国雇佣意大利防鼠疫血清发明者》一文说“中国政府挑选那不勒斯大学病理学研究所主任加里奥蒂(G. Galeotti)去抗击东北的鼠疫。”^[12]该报道介绍说,加里奥蒂教授是防鼠疫血清疫苗的发现者,该疫苗要优于目前东北使用的疫苗云云。应该说,俄国的

提议对这次国际会议最终召开起了一定的作用。

由于各国距离远近不同,来华的专家出发时间也各自不同。日本病理学家北里柴三郎博士来得比较早,他于2月11日启程赴奉天,外务部遂通知奉天方面要做好接待工作(《外部来电》,宣统三年正月十一日)^{[8]第62册,9-10}。北里柴三郎是全球知名的传染病学专家和病理学家,曾从鼠疫死者身上发现鼠疫杆菌(北里柴三郎作为德国科赫教授的弟子和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在病理学方面作出过很多贡献并因此负有盛誉。不过他对鼠疫杆菌的提取并不正确,法国医生耶尔辛提取的鼠疫杆菌才是正确的),他的到来可能给了日本方面更多的底气来和中国争夺防疫的主导权。北里柴三郎抵达奉天不久即举行了一次演说,颇得好评^[13];但由于他对于中国的防疫工作颇多非议,也招致了中国国内媒体的很多不满。

2月13日,日本关东都督大岛义昌拜会锡良,提出举行中日共同防疫会议,“由总督及都督各派委员五人议决两国在南满提议各种防疫事务,兼备总督及都督之咨询”;提出具体防疫的行政事务由各自所属的防疫总局和防疫本部负责,“不相侵越”;并提出,如果中方财政困难,日方还可以提供资金支持。但锡良觉得最后一个建议似不怀好意,所以直接拒绝。之后,锡良向军机处汇报了全部情况,但认为中日共同防疫会议这个机制似乎是可行的(《致军机处电》,宣统三年正月十五日)^{[8]第62册,20-21}。锡良大概还是觉得不太踏实,所以他随后很可能拜会了一些各国驻奉天的领事。美国驻奉天总领事费雪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把美英法等国都拉扯进来,成立一个多国组成的联席会议,以牵制日俄两方^{[5]82}。锡良可能觉得这个建议不错,就向外务部提议召开研究会,并得到了外务部的积极响应。外务部在2月15日的回电中说道“请各国西医开研究会前经电告,昨据伍医会同郭道各医商酌,择定在奉天开会最宜。现会期订三月初五日,以两星期至五星期为限。”(《外部来电》,宣统三年正月十七日)^{[8]第62册,29}从而确定了会议时间以及地点。

举行中日共同防疫会议这个议题则几经周折。出于对日本的警惕,军机处最初要求锡良对

此给予谢绝。但随后,日本驻沈阳的总领事小池再次提出申请,理由是中日双方可以随时会商,以早日扑灭疫病,是出于世界人道主义的考虑,等等。锡良认为“其持论不为不正,查防疫所以对待天灾采取各国议论以资防御,亦足为我利用。若必以闭国拒,徒启猜疑。且彼必谓我设备未周,安肆抵排,横生干涉,特于主权有损。”(《致军机处电》宣统三年正月十九日)^{[8]第62册,38-39}治疫以来,中日双方本来就是随时晤商,而这个会议只对防疫方法进行讨论,不涉及防疫的行政权限,更不会对主权产生影响,所以锡良希望军机处允许他派人员参加这个会议。

2月18日,因未能从锡良这里得到所希望的答复,日本使馆遂派人到外务部提出举行共同防疫会议的请求,并且提出了六条章程。外务部则回答:各办各事,如果有需要商量的事情,可随时商量,无需提前制定章程。日方也不坚持,只是重申此前的声明,即只互相讨论,不侵越办事权限。外务部随即指示东三省行政当局“此事所亟应处处防范者,只在他国藉端干涉致生后患耳。若于疫事有益并无流弊,自无妨互相研究,仍希尊处相机操纵,酌核办理。”(《外部来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一日)^{[8]第62册,51-52}算是默许了此事。于是在奉天,中日两国共同防疫联席会议遂得以定期召开,每周2次,总共举行了8次会议^{[9]49-50}。笔者揣测,中日之间的这个交涉过程,有可能被认为是日本最先提出召开国际鼠疫会议的根据。但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此时中国政府已开始邀请国外专家来华考察并出席联席会议,所以日本提议说不能成立。

基于上述信息,我们发现:举行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是中国政府面对外部压力,见招拆招的结果。在一番折冲之下,清政府将会议主导权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从而尽可能地保持了国家在东三省行使的主权,避免了日俄势力对东北防疫的过度干预。

三、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的准备过程

会期既定,会前的准备工作立即展开。以下分为四个方面对中方筹备会议的情况进行介绍。

(一) 来自清廷的指示

1911年2月17日,即刚刚决定会议时间和地点之后,外务部给锡良转来电报,电文如下:“伍医电称:现拟调查邻近各境染疫死亡人数分别造册,以备将来开会研究。惟地广事烦,亟须地方官襄助等语。希飭属认真协助”(《外部来电》,宣统三年正月十九日)^{[8]第62册,41}2月20日,军机处发来谕旨,指出“所有会中筹备接待事宜甚关紧要,着东三省总督会同外务部妥达布置,并派施肇基届期赴奉莅会。”(《军机处来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二日)^{[8]第62册,54-55}两天后,外务部来电确定了两件事:一是“所有会中应议事件,已飭伍医官先事预备”;二是“施右丞约下月二十后出京。”(《外部来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四日)^{[8]第62册,64-65}作为会议特使,施肇基提前到达奉天,并与锡良等人一起敲定中方参会代表及各地代表。据施肇基的回忆,他主动要求清政府任命他为治疫大臣,然后由他来任命伍连德作研究会的会长和会议主席^{[6]74}。

(二) 会议地点的确定

最初考虑的会议地点是盛京施医院,即司督阁的医院,这个地方既有医疗实验设备,也有小会议室。但随着参会人员的增加,盛京施医院的会议室不敷使用,于是又选定了新的会议地址——小河沿惠工公司陈列室^[14]。2月22日,锡良向外务部介绍了会议住宿和会场安排的有关情况:“查沈垣城内有西洋旅馆二处堪全数租赁,以备止宿。化学研究室建筑不及,现商英教会施医院,可以借用附近工艺传习所旧地作为会场,亦甚宽敞。”此外,在该电文中还汇报了会议材料准备的有关事项“至疫病之发生蔓延情形及社会习惯防卫方法,已商吉江行省派员调查,以备提问研究之资料。”电文最后提出两点请求“请施丞堂先期莅奉,各国派定医生名单求电示,以便由奉致电欢迎。”(《致外部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四日)^{[8]第62册,65-66}

(三) 会议材料的准备

锡良2月23日对于资料准备提出要求“一,疫之发生情形、蔓延状态,能绘为图表尤善;二,有疫地之各种社会习俗、卫生状态;三,发现后之各

种防卫方法及疫毙人数,能以年龄、职业、性别详列细表尤善。此外,关于症状之应研究者并乞随时酌定列入。”(《致吉江两省电》,宣统三年正月廿五日)^{[8]第32册,215-217}这样的要求让防疫一线的官员们叫苦不迭,哈尔滨的代理道台郭宗熙于次日回复的电报中就称自己负责的区域太广,而且“期限甚促恐误时期”,提出“可否由宪台电达江省抚宪,飭各医及各地方官各就本境疫情将发生蔓延及防卫诸项切实调查,分别报告,再由防疫总局汇编,似较便捷”(《哈尔滨郭司使来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四日)^{[8]第32册,191}。

吉林巡抚陈昭常显然有高人指点,两日后,他不仅积极呼应了锡良的电报,而且细化了资料准备要求“一,疫之发生情形。病初发时情形若何?有无发热、咳嗽、吐血、起核等情?病发后有无变更?约经若干日始行毙命,疫死者尸身变何颜色?染疫之家是否先见毙鼠?二,疫之蔓延状态。由何处传染而来?初传之人是何职业?更复传染何处?何处蔓延最甚?同在一蔓延地域,何地所亡人、何等人染疫最少?一并绘图到表。三,有疫地之中,上下级、绅、学、商、工及苦力各等社会,以何社会染疫为多?其染疫各社会中,始由何社会渐及于何社会?同一社会中,有无特别或减少,其原因若何?四,有疫地之疗治、看护、埋葬以及一切习俗何如?有无迷信、忌医及各项不适于防疫之习惯?五,有疫地之卫生。其衣食、住处及道路、用水、沟渠等适否何如?六,疫症发现后之各种防卫方法。甲、防卫机关。如防疫局、检疫所、隔离所、诊病所、庇寒所、防疫会等如何设立?乙、防卫人员。如中西医生、委员、警队等如何派遣?丙、防卫物件。中西各种药料及器具如何购置?丁、防疫办法。对于有疫地、无疫地及染疫人与未染疫人,按之以上甲、乙、丙、丁四项如何措置?以外又有如何办法?七,疫毙之人数、年龄、职业、月日、地址。此项要列表。八,疫症之治疗诸方法。该处医生有何发明?自发疫以来以何方法救治之为最有效?是否能言其所以然?是否设会研究?设立后之效果如何?现在各属报告治愈者甚多,恐非真正疫症。此次务须确切查明,不得稍涉含混。”(《陈简帅来电》,宣统三年正月廿九

日) [8]第32册,268-271

如此详细的回应,令锡良大喜过望,随即回电对来电大为赞赏,表示“调查纲目较敝处原议详备,毋任佩仰”(《致陈简帅电》,宣统三年二月初一日) [8]第32册,288。随即锡良要求黑龙江和奉天都依此办理。

另外,为了准备会议所需的基础资料和背景报告,在不断督促地方官员之余,锡良还致电有关部门,要求留下王若宜、王若俨兄弟,翰林院检讨王焕文以及小京官侯毓汶等人(《致军机处电》,宣统三年二月二十日;《致外部电》,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二日;《陆军部来电》,宣统三年三月初二日;《致陆军部电》,宣统三年三月初三日) [8]第62册,186、197-198、228-230,从事著译等方面的工作。

(四) 用于讨价还价的国际会议

这次国际会议也成为锡良讨价还价的重要工具,用于提出要求和拒绝他人要求等,是他在一定阶段的一枚挡箭牌。

例如,在东三省疫情基本扑灭之后,锡良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即大量直隶和山东劳工前来东北乃至沙俄打工;而以前疫情很严重时,没多少人敢来。不过尽管东北疫情基本结束,而且还有就业机会,但直鲁两省的疫情还未结束,东三省遂面临输入性病例的危险。按照先前的规定,劳工入关是需要检验的,出关则不用。现在锡良要求出关需要留验,但负责火车运输的盛宣怀却不同意,并以民族大义来压锡良,理由就是官办的京奉铁路和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存在竞争关系。但锡良早有准备,答以“开会期近,不得不力图扑灭防疫办法。各国观听所系,不如是不能杜责言”(《致邮传部电》,宣统三年二月十八日) [8]第62册,171。

又如有关京奉铁路奉天车站的展筑问题。该问题最早是上一年农历九月时讨论的,或因为疫情的缘故拖而未决。借着要开会的机会,锡良向邮传部提出应尽快敲定奉天车站的扩建问题:“京奉车站展筑至奉天城根一事,年前九月间曾经函准。大部复称已与外部商议,尚未奉复,一俟复到,即当设法妥商,以期从速议结等。因在案迄逾数月,究竟如何酌议,未准知照。奉省交际日

繁,旅客往来不绝于道。即为此次各国医生来奉会议疫事,赴京津办事者尤多,车站远隔十余里,殊形阻碍。况此事为我所利,似不应经久搁置。特此电请大部迅速议定并乞电复。”(《致邮传部电》,宣统三年二月十六日) [8]第62册,160-161 邮传部则回电说因外务部一直没有答复,故而拖延(《邮传部来电》,宣统三年二月二十日) [8]第62册,186。后来邮传部在召开国际会议一事的压力下,最终解决此事。

四、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会议进程和会议决议

关于会议的进程和主要内容,前有陈垣编写的《始末》,当下又有《报告》出版,再加上于永敏、焦润明等人的文章以及管书合近期发表的论文^[15],对会议进程都有很详细的描述,故本文仅简要介绍会议进程,另对中日参会代表进行考证,并对会议的成果进行分析总结。

(一) 会议的简要进程

无论当年的记录还是后来学者的考证,在会议进程方面都没有明显的差异。会议于1911年4月3日在奉天惠工公司陈列室举行开幕式,东三省总督锡良、清政府代表施肇基致辞(锡良和施肇基致辞原文载《始末》^[16]8139-8141,但《始末》记载的施肇基致辞与《报告》中的记录略有差异),俄国代表查博洛特尼致答谢词。会议正式代表来自中、日、俄、美、英、法、德、意、奥、荷、墨等11国;大会主席为中国的伍连德博士,其中三次会议主席为来自日本的病毒学家北里柴三郎。会议就这次疫情的疫源、传播途径、预防和隔离措施、治疗手段的有效性以及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等专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前往日本控制的旅大和沙俄控制的哈尔滨等地考察,都得到了地方当局的隆重接待,还实地考察了疫情爆发中心地傅家甸。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各方提供的证据进行讨论和认定,第二阶段是讨论和提交会议临时报告和给清政府的防疫建议。会议期间,东北的鼠疫防控宣告结束,大会则于4月28日闭幕。

(二) 中国和日本的与会代表及会务人员

与会代表都有哪些人却不那么容易确定。尽

管在《报告》中有记录,《始末》中也有记载,但实际上参会人员远多于记录下来的人数。不仅多位医务工作者,一些与防疫相关的政府官员,如哈尔滨的郭宗熙、谭道梁,长春的孟宪彝、黄宝森、李澍恩等,参加了某几天的会议,其他如任职协和的美国医生杨怀德(Charles W. Young)也曾与会——上述诸人均未列入正式代表名单。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当时各个媒体的译名不统一造成了混乱。以最为重要的资料《始末》《疫事报告书》《报告》来看,译名就很不统一。以下仅列举属于中国代表团的几位洋医生为例。《始末》写作:伍连德、全绍清、方擎、王恩绍、海儿、爱司勃兰德、司督阁、司登莱、海夫铿^{[16]8142};而《疫事报告书》则写作:伍连德、全绍清、方擎、王恩绍、山大夫、韩大夫、司督阁、师丹列、哈夫金^{[17]8449};《报告》原文为英文,则分别翻译为:伍连德、全绍清、方擎、Y. S. 王(Wang)、R. A. P. 希尔(Hill)、W. H. 格雷厄姆·阿斯普兰(Graham Aspland)、杜格尔德·克里斯蒂(Dugald Christie)、亚瑟·斯坦利(Arthur Stanley)、保罗·B. 哈夫金(Haffkine)^[18]。《报告》与《自述》的人名翻译基本一致^{[7]95-96}。这其中,司登莱、师丹列、斯坦利,以及海夫铿、哈夫金属于音译的不同;海儿、希尔、山大夫则或取音译或取意译。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应译为司督阁,这是他的汉语姓名,且因为他在中国近代医学教育方面的贡献广为人知。爱司勃兰德、阿斯普兰、韩大夫应为同一人,系大会的医学秘书^{[18]5};称他为韩大夫是由于他的中文名字为韩济京。他曾亲赴傅家甸一线防疫,在有关锡良的档案里有关于韩大夫的记录,施肇基在大会致辞中也特别向韩医士表达了谢意(施称“再北京韩医士,现经派充本会医务书记员。当傅家甸疫氛极盛之时,伊在该处襄理防疫,颇著勤劳。”) ^{[16]8141}另外,在《庆亲王奕劻为请奖派往东省各洋员事奏折》中也有“经臣部选派英国医生韩济京”“英国医生韩济京等六员,拟请赏给宝星”等字样^[19](1919年中华万国禁烟会成立,韩济京曾为总干事)。该奏折还提到“英国使署医官德来格”“副税务司法国人罗尔瑜”二人,为参加这次会议的英国代表、英国使馆医

生 Douglas Gray 和担任会议秘书的 C. H. Lauri (《始末》中记为“劳罗”,《疫事报告书》中记为“罗尔瑜”)。

中方和日方的与会者,因大多有汉字姓名,故仅仅基于英文翻译确定与会者显然是不够的。本文在此作一全面梳理,希望有助于同好能将这些人的名字与他们的事迹联系起来,见下页表[主要基于《疫事报告书》,再参考《始末》(《始末》中的大部分外国人名译名不统一,这可能是由于材料来源不同所致)和其他相关著作]。

(三) 会议决议的形成及其价值

在4月20日的第十五次会议上,议定了第二阶段会议的程序、规则,并确定向中国政府提交一份临时报告。该报告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建立在会议证据基础上的结论概要,第二部分则是着眼于预防肺鼠疫或者控制其爆发的建议^{[18]380}。经过专门委员会的几天讨论,在大会闭幕当天,与会代表向中国政府提交了各国首席代表签名的临时报告(据《报告》,签名者中缺德国代表马提尼^{[18]480},不知何故)。其中,从提交给会议的证据中得出的结论概要11条、肺鼠疫防控建议45条(《疫事报告书》中附有这两项的文言文版,当为该会议提交给清政府的临时报告中文版本^{[17]8449-8454}。部分建议有些过时,下面就不讨论了)。这里总结归纳部分会议决议并分析如下。

1. 没有有关起源的准确、充足证据,但疫源很可能和旱獭(土拨鼠)有关

会议临时结论第1条指出疫源地为蒙古之北,沿铁路和航路传播,这几乎可以视为定论,但是否源自旱獭“未能断定”,会议决议的第2~3条也和疫源有关,但均无定论;第2条指出“俄国医者一方面曾经报告,由旱獭而发”,但与会者认为“未得细菌学上确实之证据也”;第3条认为这次鼠疫的零号病人“是否由旱獭传染,尚无一定之证据”。这是会议的第一个议题,讨论相当热烈,各位与会专家均从科学而非政治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均认为当时的试验和观察并不能支持旱獭是中间宿主的结论。可见在当年,疫源和中间宿主的确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表

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中方、日方参会人员名录

英文姓名	职位	中文姓名
中国代表		
Wu Lien Teh	医学博士(剑桥),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帮办	伍连德
Chuan Shao Ching	北洋医学堂医学、治疗学和法医学教授	全绍清
Fang Chin	医学博士(千叶),北洋陆军军医学堂教授	方擎
Y. S. Wang	奉天防疫总局副总指挥	王恩绍
R.A. P. Hill	北京协和医学院讲师	希尔
W.H. Graham Aspland	北京协和医学院暨北京大学教授	韩济京
Dugald Christie	盛京施医院院长、东三省医学顾问	司督阁
Arthur Stanley	上海工部局卫生官员	师丹列 ^①
Paul. B. Haffkine	哈尔滨俄国鼠疫医院院长	哈夫金
各地的中方代表		
Woo Wai U	外科医生、朝廷侍卫,北京民政部代表	吴为雨
J. Chabaneix	北洋医学堂教授,直隶卫生局代表	夏本礼 ^②
C. W. Wong	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助理教授,奉天省代表	王若宜 ^③
L. S. Wang	奉天省政府药学顾问,奉天省代表	王麟书
M. S. Chung	道台、吉林官医院院长,吉林省代表	钟穆生
Wang Hsing An	黑龙江省代表	王兴安
B. Y. Wong	中国红十字会暨上海中国防疫医院代表	王培元
P. Quincey	上海医院住院医生	王彼得 ^④
部分会务人员 ^⑤		
Sze Shao Tsang	外务部员外郎,会议中文秘书	施绍常 ^⑥
Tsang Woo Huan	外务部郎中,秘书、翻译	伍璜 ^⑦
Li Kway Yoong	帝国海关职员	李规庸 ^[16]
日本参会代表		
S. Kitasato	东京帝国传染病研究所所长	北里柴三郎
Akira Fujinami	京都帝国大学病理解剖学教授	藤浪鉴
Shibayama	东京帝国传染病研究所住院部主任	柴山五郎作 ^⑧
Uyama	日本陆军军医	宇山道硕 ^⑨
Shimose	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医生(中佐)	下濑谦太郎 ^[22]

表注:

① 也称为史医官,或为史丹莱,存疑《盛宫保来电》,二月二十日[8]第62册,184-185。

② 《始末》译为“霞把臬克司”,但《疫事报告书》译为夏本礼。后者更官方,且根据其他译名,后者的准确度相对较高,夏本礼也比较像外国人使用的中文姓名,故采纳。

③ 据陈垣记录,奉天代表有二人,王若宜和王麟书。有关锡良的档案也有记载。王若宜是陆军军医学堂的教学,与《报告》中C. W. Wong的官职较为相符。

④ 《报告》中有P. Quincey,为上海公立医院代表。《疫事报告书》记录为王医生,《始末》中为王彼得,疑P.为Peter的缩写。

⑤ 有几位会务人员为外国人:韩济京担任会议医学秘书,罗尔瑜担任会议秘书,H. J. W. Woodhead《疫事报告书》中为吴德海,《始末》中为俄太得担任会议速记。

⑥ 《报告》将会议中文秘书Sze Shao Tsang译为石绍曾,根据《始末》《疫事报告书》及有关锡良的档案,应为施绍常。

⑦ 《报告》将总翻译、来自外交部的官员Tsang Woo Huan译为曾武环,而根据有关锡良的档案(《致外部电》,四月十三日)[8]第62册,348-349、《始末》和《民国人物大辞典》,应为伍璜。至于为何多了一个Tsang,待查。《民国人物大辞典》载:伍璜,字芷庵,江苏江宁人,1870年(清同治九年)生。美国留学生。历任津浦铁路局通译官,外务部秘书,北京政府外交部佥事,驻纽约领事^[20]。

⑧ 《疫事报告书》与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21]均记为柴山五郎作,杜山佳《万国防疫会记》中所收与会代表照片的标注也为柴山五郎作^[22]。而《始末》中只记录了姓氏柴山,《自述》中则为“柴山五郎”。

⑨ Uyama,在有关锡良的档案《外部来电》,三月初五日[8]第62册、《疫事报告书》等中均记为宇山道硕。《始末》《报告》均只记载其姓宇山;又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记为“守山道硕”,而《自述》中译为“宇山道作”。

2.在捕猎旱獭的集散中心应建立隔离所和疫病院

决议第8条指出“每当猎取旱獭之季”,要进行医学监控;在猎户聚居的地方,应“设立隔离所和临时疫病院”。这一条是来自中国防疫的实践经验,而且这一条在相当程度上是在事实上接受了旱獭是重要中间宿主的结论。

3.关于遮断交通的手段及其原则

这是关于这次鼠疫防控中遮断交通的经验总结^[23]。具体手段见第12条以及第35~38条。第12条是关于对出现疫情区域的交通管控“如有一区域或一街道、胡同发生肺疫,较他处为甚者,当即遮断交通,禁止出入。”而第35~38条则是关于对中远程货物和人员流动进行交通管控的建议,如通过建立交通管理协调机制、尽量吸引人员通过火车和轮船来往、实施卫生检疫并发给证书等方式,对流动造成的疫病传播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小。另外,在《报告》中,有“制定的条例应该本着最小程度限制交通,同时却在控制传染流行方面取得最大的效果”^{[18]489}的建议。

4.隔离非常必要,且应一人一间,同时人们应尽量避免聚集性活动

会议决议的第12~16条都和隔离措施有关。会议决议指出“肺疫预(豫)防之法,最要者为隔离。”疫病院应该“使疫病者独居一室”,疑似疫病院和隔离留验所也应如此,并认为“以区分小间卧室,使居者彼此不通为最善”。还指出:人员聚集性活动,如“学堂授课、礼拜堂宣教、戏园市场等营业,皆当停止”;相应地,交通工具如“搭客之车,须禁止其通行”,但马车、骡车、人力车等不必禁止。

5.明确给出了防疫人员个人防护建议

这一点主要见于会议决议第24条。包括以下几个要点:首先,尽管会议决议不确定血清是否有效,但仍建议“注射预(豫)防液”,并认为是“大有裨益之事”。其次,要求防疫人员戴口罩(呼吸囊)，“以掩口鼻”，“因此疫在吸气时最为危险,查有确据”;并规定了口罩的样式,指出用过一次就应“即行消毒或烧毁”。再次,要求防疫人员“着长衣及用避毒手套”,还规定其材质应是“不透水

之材料”;如果和病人接触,还要佩戴护目镜,“以免病毒溅入目内”。可见,尽管一百多年过去了,面对飞沫传染,口罩、防护服、手套、护目镜这四件套依然是防疫人员的标配。最后,是关于防止院内感染的措施。接触过病人的防疫人员,“其所着衣服,立即消毒”;防疫人员每日由医生诊察两次,观察是否发热并进行登记。

6.在东北各地建立铁路防疫协调机构,以及建立标准统一的港口卫生和检疫办法

决议第33~34条建议在东北的铁路公司之间建立防疫的统一规制,以及负责医务和防疫的统一协调机构,这一建议的背景则是当时东北的复杂局面。类似的原则也适用于各港口,会议代表也了解到不同港口在疫情期间的检疫标准并不统一。

7.建立可扩展的中央和地方卫生管理机构,开展现代标准的医学教育

见会议决议第23条、第42条和第44~45条。第23条认为,地方行政当局“应常设医务及卫生专部。遇疫病发生时,方能立时对付”,强调的是对疫病的快速反应。第42条则强调卫生管理机构的可扩展性“一遇疫病发生,可以扩充办事。”第44条则强调全局统筹“务须设立中央卫生局,以管理传染病及谋通信之便。”建议中还特别强调了建立统一防疫规章“如中央政府能订定统一之规条,以管理卫生,则更妥善。”会议决议的最后一条,即第45条,则建议在中国建立医学教育培养体系“观之今日,当在中国造就最高之医学人材为要务。”

尽管随着时代的推移,会议决议中的某些部分已显得过时,但从上面的各条款不难看出,部分建议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有的建议对我国当年的防疫和医学进步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五、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的余响

本文基于对档案资料的梳理和对比,并运用一些罕见的国外相关资料,对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的缘起以及会议代表等问题做了初步的考证,对既往研究中的部分错讹之处进行了修订,还对

这次会议决议的价值进行了简要分析。

但仍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如为准备万国鼠疫研究会清廷内阁召开御前会议的情况,以及曾经在会议上发言的部分代表的确切身份等[例如根据《报告》的记载,积极参与讨论的安德鲁医生、刘易斯医生,在会上发表研究报告的 Kasai(笠井,《始末》中为河西)医生等人的确切身份,目前还不能确定。此外,《报告》记录也可能有错误,如将《鼠疫在长春的流行》的报告人记为 Zhong Pao Shun 道台^{[18]308},而参考《始末》的记载,应为时任长春防疫局正医官的黄宝森]。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对于中国防疫事业的发展与转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 对肺鼠疫的持续性研究将中国细菌和病理学研究推上了新的高度

万国鼠疫研究会后,伍连德和陈祀邦与其他中俄专家一起考察了蒙古和西伯利亚等地,获得了第一手的资料。伍连德及其团队从此致力于肺鼠疫研究,进行了一系列的细菌学实验和病理观察;他们的成果以中英文形式在国内外发表,赢得了国际声誉。1926年,伍连德在国联出版代表作《肺鼠疫概述》,首次认定那一场东北鼠疫病毒的中间宿主确实是旱獭^{[7]486 [24]}。因为对肺鼠疫研究的贡献,伍连德曾获得诺贝尔医学及生理学奖提名。

(二) 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的成立和疫病院的建设

在伍连德的坚持和东三省政府的积极支持下,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最初名为北满防疫事务总处,后因服务范围扩大到整个东北,故更名)于1912年在哈尔滨成立,伍连德长期主持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并多次拒绝了中央政府调其回北京的命令。在此期间,在口岸和旱獭集散地建立疫病院、隔离所并进行口岸检查的建议得以落实,防疫事务总处先后在哈尔滨、同江(拉哈苏苏)、依兰(三姓)、瑗瑛(大黑河)、满洲里和营口(牛庄)建立多个疫病院和检验所^{[7]464-466,568-577}(其中滨江医院、满洲里医院和营口医院均兼具综合性医院和防疫医院功能)。防疫事务总处的成立

和疫病院的建设,在十年后的第二次鼠疫大爆发中发挥了作用,可谓未雨绸缪。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还先后七次出版了《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报告大全书》,并一直运作到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伍连德等人还积极推动民国政府收回港口检疫权,伍连德首任卫生署海港检疫处处长并长期担任此职。

(三) 中央防疫行政机构的建立

根据会议的建议,清政府当年即成立北京防疫事务总局,但次年清政府倒台,该机构未能发挥作用。此后北洋政府时期,长期未设立中央防疫行政机构。1918年绥远山西鼠疫大流行过后,北洋政府亦意识到成立中央防疫指导机构的重要性,乃利用此次防疫剩余款项,于1919年3月在北京天坛神乐署成立国家防疫机构——中央防疫处。该处归属内务部卫生司,司长刘道仁受命筹办并兼首任中央防疫处处长。参与傅家甸鼠疫防控并参加过万国鼠疫会议的中方代表、伍连德的两位重要助手全绍清和方擎曾先后出任中央防疫处处长,来自英美的会议代表德来格和韩济京曾先后出任中央防疫处委员会委员,参与傅家甸防疫及鼠疫会议资料整理的侯毓汶曾担任该处疫病科科长^[25]。

(四) 形成了兼具历史和医学价值的《东三省疫事报告书》

《疫事报告书》是目前研究庚辛鼠疫时经常被引用的参考资料。与以往的官方防疫减灾报告相比,该报告书内容异常翔实,除防疫措施以外,该报告书还记载有东三省各地每日死亡人数统计、流行病学调查的输入路径及疫情情况;图表很丰富,还附有疫情期间的照片等。该报告书是此次万国鼠疫研究会的一个副产品,建立在为会议准备的资料的基础上。如前所述,经过锡良和陈昭常的互动,统计资料的基本内容和格式得以确定和统一。会议进行期间,锡良建议东三省一起编纂疫事报告书,得到了吉林巡抚陈昭常和黑龙江巡抚周树模的支持(《致陈简帅电》,三月二十二日;《陈简帅来电》,三月二十四日^{[8]第32册,50,64};《致周朴帅电》,三月二十二日;《周朴帅来电》,三月二十三日^{[8]第39册,272-273})。几位主要的编纂者

也很得力,他们都是深度参与东北防疫的政府官员,如张元奇、韩国钧是中日交涉的中方主要代表,邓邦述、郭宗熙则分别为疫情期间吉林和哈尔滨防疫总局的总办。

(五) 推动中国医学及医学教育的发展

伍连德与多位同行一起创建了中华医学会并担任创会秘书,创办《中华医学杂志》并担任主编。他还主持和参与了多座医疗机构的修建,如主持创建北京中央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齐齐哈尔官医院等,参与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创建工作;在东北期间,伍连德基于对防疫后备力量的培养考虑,在1926年创办了滨江医学专科学校(现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前身)并担任首任校长,而主持学校工作的首任教务长则是和他一起出发前往傅家甸的原陆军军医学堂学生林家瑞。

不仅如此,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在防疫经验和人才储备等多个方面对此后的多次防疫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如1917—1918年绥远和山西鼠疫、1919年东北霍乱、1920—1921年东北第二次鼠疫大爆发,这几次防疫的主要负责人和相当一部分骨干力量均参加了此次会议。

参考文献:

[1] 于永敏、刘进、王忠云《沈阳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4期。
[2] 马学博《万国鼠疫研究会与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的建立》,《医学与哲学》2006年第7期。
[3] 焦润明、焦婕《清末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考论》,《辽宁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4] 高龙彬《伍连德与东北防疫处的创立和演进(代序)》,李冬梅主编《伍连德及东三省防疫资料辑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版。
[5] William C. Summers, *The Great Manchurian Plague of 1910-1911: The Geopolitics of an Epidemic Disease*,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6] 施肇基《施肇基早年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
[7] 伍连德《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程光胜、马学博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8] 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三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
[9] 韩国钧《永忆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

刊》(第一辑第9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
[10] Eli Chermín, “Richard Pearson Strong and the Manchurian Epidemic of Pneumonic Plague, 1910 - 1911”,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Vol.44, No.3, 1989.
[11] “EUROPE SAFE FROM PLAGUE: Dr. Farrar, About to Start for China, Says Danger Is Negligible”, *The New York Times*, Feb.19, 1911, p. C4.
[12] “Galeotti to Fight Plague: Italian Inventor of Anti-Plague Serum Employed by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Feb.20, 1911, p.1.
[13] Kitasato, S. “INTERESTING LECTURE ON PLAGUE”, *The North -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May.10, 1911, p.551.
[14] 邵宇春《沈阳历史上的首届国际学术会议》,《兰台世界》2009年第21期。
[15] 管书合《国际合作与防疫主权:1911年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再研究》,《史学月刊》2020年第6期。
[16] 陈垣《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十二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17] 《东三省疫事报告书》,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十二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18] 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张士尊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
[19] 王道瑞编选《清末东北地区爆发鼠疫史料(下)》,《历史档案》2005年第2期。
[20] 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9页。
[21] 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变迁》,朴彦、余新忠、姜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57页。
[22] 杜山佳《万国防疫会记》,《东方杂志》1911年第3期。
[23] 杜丽红《清末东北鼠疫防控与交通遮断》,《历史研究》2014年第2期。
[24] 管书合《1910—1911年东三省鼠疫之疫源问题》,《历史档案》2009年第2期。
[25] 《中央防疫处一览》(1926年),民国时期文献保护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民国文献类编》(医药卫生卷,第984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第308-323页。

[责任编辑:房宏琳]

· 本刊中青年作者简介 ·



高新民

1957年生，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心灵哲学兼及西方哲学史、宗教哲学和人生哲学研究。近年来，以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西方心灵哲学及其比较研究”为契机，将研究重点转向印度心灵哲学、中国心灵哲学、西方心灵哲学新近发展、比较心灵哲学、中国特色心灵哲学的当代建构等方面。出版专著20部、译著6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专著《现代西方心灵哲学》获“金岳霖学术奖”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两篇论文于1995年、202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科学对“无”的“思入”及其本体论意义》（2012年第5期）、《内格尔的“主观观点”与泛心论的“发展”》（2014年第2期）、《心理现象是真实属性还是人为归属？——解释主义对物理主义的发展》（2017年第8期）、《关于心灵观建构与发展的若干思考》（2020年第11期）。

魏众

1968年生，天津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史研究》主编。兼任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劳动经济学会常务理事。2017年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收入分配与贫困、劳动力市场、医疗体制改革、中国经济思想史等研究。出版《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等多部学术著作，在《经济研究》《中国人口科学》《中国农村观察》、China Quarterly 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20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主编、参编学术成果荣获包括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在内的省部级奖项7项，多次被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办邀请提供政策咨询，政策研究成果被国家“十二五”规划等政策文件所吸纳。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史事新证》（2020年第11期）。

